

【马克思主义理论】

邓小平辩证发展观对新时期科学发展观的贡献

赖 宏, 谢昌荣, 钟昭锋

(中共江西赣州市委党校, 江西 赣州 341000)

摘 要: 邓小平辩证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两者在内容体系上是一脉相承的, 邓小平辩证发展观的丰富内涵构成了科学发展观主体, 而且, 邓小平辩证发展观在落实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为我们实施科学的科学发展观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镜鉴。

关键词: 邓小平; 辩证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 贡献

中图分类号: A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4)03-0029-06

Contribution of DENG Xiaoping' dialectical viewpoi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ings to the modern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point

LAI Hong, XIE Chang-rong, ZHONG Zhao-fe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chool of Ganzhou Municipal Committee, Ganzhou 341000, China)

Abstract: The main content of DENG Xiaoping' dialectical viewpoi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ings is similar to that of modern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point. DENG Xiaoping' dialectical view poi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ings forms the main body of modern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point. And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during carrying out DENG Xiaoping' dialectical view poi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ings guide the carrying out of modern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point.

Key words: DENG Xiaoping; dialectical viewpoi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ings;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point; contribution

建国以后, 如何尽快医治多年的战乱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创伤, 探索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 成了中国共产党最迫切的任务。我们党围绕如何推动经济和社会全面、快速发展进行了一系列摸索, 在不同的发展时期, 形成了具有我们自身特色的发展观, 概括起来, 主要有三种:

第一是非均衡发展观。主要在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实施。主要表现在: 产业发展上的非均衡性。这一时期, 把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来抓。毛泽东提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党在这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逐步实现国家

的工业化”^[1]。

分配政策上的非均衡性。中国在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过程中, 当时为了解决资本相对稀缺与发展重工业目标之间的矛盾, 国家占有了工人绝大部分剩余价值, 采取高积累的分配政策, 把利润投入以重工业为主的扩大再生产之中; 对于农村, 也实行了过度提取农业剩余为工业积累资本和对城市偏向的非均衡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 直接导致出现了当前仍然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这是非均衡发展观带来的必然结果。

战略与国情的不协调性。在经济发展战略上, 存在着人的主观愿望与经济发展规律的对立现象, 如提出盲目赶超战略, 党的八届二次全会还提出:

收稿日期: 2004-06-30

作者简介: 赖 宏(1966-), 男, 江西宁都人, 中共江西赣州市委党校副教授, 从事邓小平理论、党建工作研究。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我国工业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科学和技术在实现“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尽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提出争取七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的非常不切实际的要求。这种速度上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了产业上的非均衡布局,最终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结果,我们不仅没有超英赶美,反而被许多后发国家所赶超。

方法与目的的背离性。1978 年以前,“阶级斗争”和“革命路线”是出现频率最高的高频词组,毛泽东时代的发展观,是将“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视为发展的方向杆、前提、基础和终极动力,认为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而且,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国力增加和财富增长,最终是为了阶级斗争的彻底胜利,与改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出现了背离。

第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施的邓小平辩证发展观。邓小平强调经济社会全面的发展,强调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发展的相互联系、协调,通过有先有后、有轻有重、有全局有局部等一系列的发展战略或措施,最后目的是达到全面、共同的发展、共同富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邓小平辩证发展观。邓小平的辩证发展观不仅借鉴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一些优秀成果,而且吸收了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有益思想,也采纳了建国以来的非均衡发展观中的合理内容。

第三是十六大以来新一代领导集体倡导的科学发展观。虽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党中央就认识到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协调和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性,制定并开始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开始注意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和人口的协调问题,开始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且,在“十五”计划中也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但明确地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的基础上,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提出来的;是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和深层次的矛盾的状况,如: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发展不够全面、不协调、持续发展能力较弱、城乡差距拉大、区域差距扩大、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社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等突出问题和矛盾,其基本内涵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非均衡发展观、邓小平辩

证发展观逐渐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观的进步。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必然要从前两种发展观中汲取合理的养分,从我国发展观的历史演变进程看,邓小平辩证发展观对科学发展观的确立与形成有着突出的贡献。

一、邓小平辩证发展观,为科学发展观的确立率先做了理论上、实践上的探索

首先,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从片面重政治运动到全面重视社会主义各方面建设的转变,在发展战略上突破了非均衡发展观。过去存在的以政治热情来推动经济建设、片面强调政治发展的重要性的做法,是一种典型的非均衡发展思想。邓小平深刻反思了建国 30 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重新确立了在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上的正确观点,强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邓小平 1974 年就提出了把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的观点,提出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大局,要全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批评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热衷于政治运动),不敢抓生产(不去发展经济)”是“大错特错”,^[2]并且为生产力正名,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和真假社会主义的标准。邓小平指出:“多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3]1978 年 12 月 13 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根据这一报告精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指导方针,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经济发展,生产力发展,实现了战略重心的转移。这使我们在经济发展战略上顺利突破了偏重政治运动的非均衡发展观。

其次,从片面重计划转向市场与计划手段并举,在发展手段上打破了非均衡发展格局,并引导经济和社会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针对人们长期形成的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的传统观点,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

是经济手段。”^[3]邓小平的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看做属于政治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人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认识上有了重大突破,解除了长期悬挂在人们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搞市场经济等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清除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观念性阻碍。

第三,从片面的跨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想国”回到现实,打破了赶超阶段的非均衡发展思想,实现了向尊重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固有规律和中国国情本来面目的回归。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估计过高,因此,把一些只能在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才能办的事情,试图拿到社会主义低级阶段去做,从而混淆了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的界限。1980年,邓小平在谈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时说:“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2]邓小平和我们党经过认真反思,对中国现实国情的认识不断深化,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最大的国情的科学论断。

第四,从片面重视国内力量搞建设到构筑全方位对外大开放大发展格局的转变,打破了发展环境上的单独依靠国内的封闭性和非均衡性。建国后,帝国主义对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实施全面封锁,这种国际环境客观上造成了我们陷入一种围城状态。但另一方面,我国在对外交往方面也显得主动开拓不足,谨慎有余,尤其是经济发展方面过分强调自力更生、拒绝其它国家的资金流入与友好援助,基本处于“闭关自守”的状况。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强调要抓住机遇,对外开放,发展自己,并明确提出对外开放是中国一项基本国策,要长期坚持。这样,邓小平就打开了中国长期封闭的大门,使我们的发展走向依靠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的正确轨道。

二、邓小平辩证发展观有着丰富的内涵,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理论和实践源泉

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也是邓小平论述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单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发展”一词就出现过610次。在他关于“发展”的论述中,内容相当丰富,涉及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方方面面的内容,形成了邓小平的

辩证发展观。新时期的科学发展观,从它所涵盖的内容看,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持城乡协调发展、坚持区域协调发展、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人为本等等,“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既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问题,又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4],内容也是相当丰富的,这些丰富的内容在邓小平的辩证发展观中大部分都有涉及,可以说邓小平辩证发展观的许多内容已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内核,所以,温家宝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中也说,“科学发展观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4]考察邓小平辩证发展观的内涵,我们可以发现,从辩证发展观到科学发展观的发展,里面有几条前后相贯接的脉络,这几条脉络清晰地呈现了科学发展观对辩证发展观的承继关系:

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秉承邓小平辩证发展观“发展才是硬道理”之脉。无论是辩证发展观还是科学发展观,都强调发展经济是核心。邓小平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3]温家宝强调“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发展,首先是要发展经济”。^[4]这充分说明“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论同邓小平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理论的一脉相承性。这种一脉相承不是简单的秉承,而是在内容上进一步拓展、深化。邓小平极为重视发展问题,把发展摆到了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地位。他经常论述发展问题,多次强调指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经济发展是个基础;发展才是硬道理。综观邓小平所讲的发展,都是讲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外交关系的发展,一句话,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我们现在讲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则进一步把发展同党如何执政紧密联系起来,指明发展是党执政兴国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首要问题。这就把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理论进一步拓展为共产党执政的理论,深刻回答了党执政干什么和怎样执好政的问题。用这一理论指导实践,就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与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通起来,也把辩证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连接起来了。

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秉承了辩证发展观的“三个有利于”之脉。邓小平同志说,检验我们的理论、政策和工作,“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

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他把“三个有利于”作为理论、工作、政策的基本尺度,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体现了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主体、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价值观。1994年,我们曾明确地提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新一代领导集体继承这一思想,高举科学发展的大旗,将以人为本写进了自己的执政理念,用以人为本实现了对“三个有利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三个有利于”是从判断理论是非和政策是非的客观标准提出问题的,依据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以人为本是从党的工作准绳、执政要求的角度提出问题的,依据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同一基本原理。“三个有利于”标准和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要求都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依据,关注的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但科学发展观突出强调的以人为本把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从判断理论是非和政策是非的根本标准,提高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想和执政理念,无疑是科学发展观对辩证发展观继承中的一种升华。

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秉承了辩证发展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之脉。强调按照辩证发展观来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邓小平的一贯风格,这突出地表现在邓小平同志关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基本方针上,这也是邓小平辩证发展观的最生动的体现。

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经济与反腐败要两手抓的问题。他多次强调,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好,社会风气坏,即使经济成功,也不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而且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使发展走向我们意愿的反面。1986年初,他针对我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相适应的状况,明确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个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3]这与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相统一。

又如:速度与效益、稳定与发展两手抓的问题。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于速度与效益、稳定与发展

问题,作了辩证而科学的分析:“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里,邓小平既强调了经济发展速度的要求,又反对唯速度的冒进思想,既强调经济稳定发展的要求,又反对把稳定当做小脚女人走路那样一步三摇、畏缩不前的错误观念,强调了速度与效益、稳定与发展的两手抓的要求,这与科学发展观强调的协调发展要求相一致。

再如:当今发展与持续发展两相兼顾的问题。中国资源总量不少,但是人均占有量比较低。今后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对资源总量的需求更多,环境保护的难度更大,特别需要实施可持续发展,对此,邓小平同志早有认识。早在1989年,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一次指出:“我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发展战略和规划,……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3]这种认识与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可持续发展相吻合。

由此可见,邓小平辩证发展观中有蕴含着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出现的,但内容相当丰富的关于以人为本、持续、协调、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思想,是科学发展观重要的理论源泉,这些内容对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起到重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说,没有邓小平的辩证发展观,就不可能有当今的科学发展观。

三、邓小平辩证发展观在落实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为今后我们实施科学发展观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镜鉴作用

邓小平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观念有鲜明的辩证色彩,如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然后全面推动改革;先东部发展,后西部发展,然后共同繁荣和发展;先一部分人致富与后共同富裕;既要重视物质文明,又要重视精神文明与法制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这种有先有后、有轻有重、错落有致,最终达到全面、协调共同发展的辩证发展观,其实质也是科学的科学发展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辩证发展观的指导下,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展。但同时,我们当前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中又确实面

面临着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突出的矛盾,如东西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分化等,这是25年改革开放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问题,最少是没有解决好这些问题,这个事实不可否认。由此导致一些人出现了一些模糊认识,认为是邓小平的辩证发展观导致了今天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并进而否认邓小平辩证发展观及25年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科学性。我们认为恰恰相反,事实上正是我们没有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辩证发展观,才导致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不是邓小平的辩证发展观本身存在问题,而是我们在落实邓小平的辩证发展观的过程中存在着偏差。深刻总结这些教训,对于我们实施科学发展观将提供莫大的镜鉴作用。

一是不能以中心代替全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辩证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中都是重心和核心,这本身不是错误,但是,如果以中心代替全部,就必将犯不可饶恕的错误。

邓小平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他观察世界的眼界、思考问题方法都是辩证的、科学的。他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首先要注意经济的发展,但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必须同时致力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经济发展在全部发展中必须处于的中心地位,确实表明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基点在于经济建设,对中国这个长期贫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基于经济的、物质的价值诉求是置于首位的,也是最为迫切的需要。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和保障。即经济发展要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建设相结合。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一方面“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3]另一方面,他又说,“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不能单打一”,“需要综合平衡”。^[3]可见,邓小平辩证发展观并不认为经济发展可以代替全面综合的发展。是我们在落实这个发展观的过程中,走了样,变了形,导致出现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读为以经济建设为一切的问题;出现了只埋头发展经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问题;出现了用经济发展一俊遮百丑的问题。我们在实施科学发展观强调的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时候,要牢记这个教训,再不能犯以中心代替全部的错误。并且,在实施科学发展观过程中,再不能容忍有的人用经济中心论为自己的贪赃腐化、阻碍社会文明进步而辩护,用经

济中心论为树个人的政绩开路,用经济中心论为不切实际的好大喜功而开脱,因为,放纵他们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是让他们恶意地、任意地曲解经济中心论,曲解科学发展观,最终将导致对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这个科学发展观的本质的损害。

二是不能以速度代替质量。鉴于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的差距、鉴于国际上经济竞争激烈、鉴于我们周边国家和一些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要争取有一个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他多次说过,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只有以比资本主义更快的速度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才能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强调“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3]1992年他在南方视察时,再次敦促“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邓小平既强调发展要有速度,同时也强调发展要讲效益和质量,他说:“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定、协调地发展。”^[3]这说明,邓小平的辩证发展观是既重速度又重质量的。但各地在落实辩证发展观的过程中,只取速度,不顾质量的倾向非常明显,造成今天出现虽然经济总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如国内生产总值2003年的11.669万亿是1978年的3624.1亿元的32倍,但仍然存在贫富分化、差距过大现象,经济增长并不是给全社会的成员带来普惠,而是出现了精英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分化。在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前,出现这个结果应该说不是孤立的,因为国际上早就有这种发展模式的先例——“哈罗德—杜马模型”。这种发展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生产先于分配,发展和公平不可兼得。这种思路在落实邓小平辩证发展观的过程中被演绎成这样:从经济的角度看,经济的高速增长就是一切,为此甚至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方面的代价。各地都强调只要把经济总量这块蛋糕做大了,其它一切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事实说明,只要速度,不要质量和公平,必然带来社会发展不平衡。我们在实施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一定要牢记这个教训,确立速度、效益、质量、公平和谐发展的观念。

三是不能以一时代替持续。1980年3月联合国大会第一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后,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内涵作了界定和阐发,关于可持续发展有了一个大致的约定俗成说法,即可持续发展主要是指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992年6

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制定颁发了《21 世纪议程》,明确提出了要在世界范围内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邓小平的辩证发展观中,有丰富的可持续发展的内容。邓小平在考虑发展问题时,始终把一时之发展与长远之发展关系的正确处理作为他思考的一项重要内容。但由于对邓小平辩证发展观的不正确理解,不少地方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不计后果,靠拼设备、拼消耗去换取一时的发展速度与成效的急功近利做法,为了今天的发展速度而透支了未来的、长远的发展潜力,致使在人口、就业、社会保障、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方面出现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实施科学的发展观,一定要协调好眼前发展与长远、持续发展的关系,我们不能走“竭泽而渔”的发展道路,应该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更具潜力和前景的发展模式,合理使用设备、利用资源,努力使较高的发展速度保持相当长的时期,使发展有充足的后劲。这既是科学发展观对我们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应对全球资源的短缺和环境的恶化的有效措施。我们不能走以能源消耗换取经济发展的道路,以一时发展牺牲后人持续发展的道路。

四是不能以增长代替发展。对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认识,在世界范围内曾经经历了一个由不科学到科学的过程。西方经济学产生之初,发展与经济增长几乎是同义词。到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对发展含义的解释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并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汉斯·辛格在一篇论文中明确指出:“不发达国家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增长问题,还有发展问题。发展是增长加变化,而变化不单是在经济上,而且还在社会和文化上,不单是在数量上,而且还在质量上。”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发展经济学家达德利·西尔斯明确地反对把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目标,指出:“对于一个国家发展来说,应该提出的问题是,贫困发生了什么变化?失业发生了什么变化?不平等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这三个方面都变

得较不严重,无疑,这个国家就经历了发展。如果这三个中心问题中一个或两个恶化了,特别是三个问题都恶化了,那么,即使人均收入成倍增长,把这种结果称为是发展也是不可思议的。”^[5]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观被赋予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20 世纪 90 年代又添加了以人为本的内容。这说明,至少在上世纪 70 年代起,世界上对发展观的认识就可以说是科学的了。但我们在落实邓小平的辩证发展观过程中,没有很好地把握其精神实质,以至于像“一切为了经济发展”、“一切服从于经济发展”、“一切必须为经济发展让路”等片面、过急口号成了许多地方的时尚。由此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不少地方简单地把经济总量的增长看成发展,并催生了一种狂热的 GDP 情结和追求泡沫政绩现象,加剧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当前,在实施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们要引以为戒,要彻底纠正一些地方和领域出现的重经济指标、轻社会进步,重物质成果、轻人本价值,重眼前利益、轻子孙福祉的偏颇。要把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多方面因素糅进现在提倡的发展观之中,使之成为指导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真正的科学发展观。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2]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3]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 温家宝.提高认识 统一思想 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N].北京:人民日报,2004-03-01,(2).
- [5] 张家杰.邓小平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研究[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杨彬智]